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12年 第9期

总刊第27期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编

要 目

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研讨会

建设幸福中国与幸福国际	幸福的时代感很强
从积极心理学看幸福	细化的幸福研究
幸福的整体经济学框架	从微观和宏观看幸福
幸福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贡献	幸福是可以传染的
幸福是可以预期的	幸福需要回归信仰
幸福需要心理健康	幸福的四个基础
不幸福的经济学分析	用机制去构建幸福
幸福的度量与幸福感	

简 讯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发布会在京召开
CCG 主任参加“2012 中关村论坛年会”
CCG 出席“海外人才引进与城市国际化论坛”
CCG 参加第十三次全国皮书年会
CCG 参加“2012 中国宁波国际人才高层论坛”
CCG 联合主办“2012 中国高等教育暨海外人才论坛”

www.ccg.org.cn

电话: 010 - 6561 1038, 6561 1039, 6561 1041 传真: 010 - 6561 1040

邮箱: bianjibu@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主办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汤敏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张旭东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鲍曙明 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监会研究员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郭生祥 澳大利亚澳华金融专家协会理事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胡元豹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执行长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罗立大学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磊 日本法政大学工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罗亚东 美国迈阿密大学战略与国际商务讲座教授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彭维刚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数学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学院教授

隋殿志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助理校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唐永春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中心主任

王坚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传播学院教授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王晓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玫瑰石顾问公司独立经济学家

谢宇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真格基金会创始人

许晔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颜海平 康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京大学国际MBA国际院长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赵红心 美国圣路易大学财经教授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执行主编：苗绿

责任编辑：程庆伟

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研讨会

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研讨会

2012年9月8日，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主楼会议室召开，探讨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特点、变迁、影响因素及社会意义，为中国国民幸福体系的建设和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此次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第二届国际积极心理大会幸福企业论坛筹备委员会承办。会上来自国内外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及媒体评论家围绕中国在转型期国民幸福面临的问题，剖析了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分享了国内外各种积极探索的实践，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王辉耀、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彭凯平、万国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客座教授孙立哲、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钱镇、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辉、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周塞峰、中国银监会培训中心副主任陈伟钢、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党总支书记李虹、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李义平、中国青年报新闻部副主任梁国胜、RIM 中国董事长刘征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齐建国、工人日报社副总编、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石述思、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Dechert LLP 合伙人王卫东、麦可思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娇等。

追求幸福一直是全人类矢志不渝的目标。在探索幸福本质的道路上，中国人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变化，不仅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使人们自主和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从此开始由过去一元性政治价值观向多元、个性与人性化的价值观转化，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开始具

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些改变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幸福观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伴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一些消极和负面的思想也纷至沓来，人们的幸福感不但没有与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升，反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也暴露出一些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

提升国民的幸福感是一项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中国政府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经代表政府承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从发现价值观问题到建设中国的国民幸福体系，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在人文建设、心理建设、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放创新，找到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钥匙，成就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建设幸福中国与幸福国际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

今天谈中国人的幸福观也好，谈中国人的幸福也好，实际上跟社会有非常大的关系。刚才有专家讲的很好，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不光是经济转型，价值观等各方面，包括理念上都在转型，这个转型需要一些新的推动，需要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从过去来看，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2 亿农民工在全国流动，包括在沿海，赶上了全球化的机遇，跟全世界的消费者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从深入来看，未来 30 年我们能不能持续下去，要深入挖掘和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经济上一定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更深入、持久的成功，这个话题很大。

我讲几点，第一，中国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单独中国人个人的幸福问题，要上升到新的思想解放来源上，上升到新的理念更新来源上，上升到这个高度，未来会引起公民的重视，包括引起政府的重视。中国很有中国特色，有很多的运动、口号，还没有从中摆脱出来，我们需要逐渐改变，还要借鉴过去的一些做法，比如在毛泽东时期我们以阶段斗争为纲，邓小平时期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江泽民时代是三个代表，胡锦涛时期是科学发展观，那往下开十八大，未来是什么样新的理念来持续我们的发展，这是值得大家进一步探讨的事。

今天谈了很多中国的问题，包括社会不公平，制度不开放，还有很多目前遇到的问题，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大家能抓住，唤起大家的意识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思想解放。讨论中国幸福观也好，讨论中国人的幸福也好，能不能形成这么一个功效。80年代刚开放时，《中国青年报》组织过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就是解放思想，开启民智，引起了大家对自我价值观的重视，那现在能不能来一次什么是中国人幸福的讨论，或者如何建立幸福中国的讨论，如果这样这个事在上上下下能引起一定的思考，这个东西不是抽象的，今天谈的都很具体，在各方面都印证了这个话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们谈幸福观、幸福指数，现在中国已经有 20 多个地方政府在谈幸福，广州提出要打造幸福广东，江阴要打造幸福江阴，但我看江阴的片子时主要还是强调 GDP，建了多少硬件，建了多少什么活动中心等这类，还是把它理解成一个硬件的建设，建设中国人的幸福观实际是个软件建设，是个观念的更新，是个价值观的新革命，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讨论，包括接下来幸福经济心理学大会，进一步推向深入，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中国未来，对社会共识的建立，给政府提供一些新的建议，这个会谈能起这样的作用我觉得就非常有价值。

大家可以讨论，可以探讨，但我们要提出新的理念，要提出新的价值观，能把大家结合起来，能激起大家的共鸣。过去 30 年发展是 GDP 导向，能不能改成幸福导向？政府考察就是当地的人民幸福吗或你们做的工作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能不能转换一个思维，用幸福作为一个价值衡量、评比、导向，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创新的，是能抓住大家共鸣的。

我们很奇怪，衣食无忧，房子都很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为什么不幸福？或者说很多人不幸福，这就值得我们深究，值得研究，对学术界、政府包括给产业都提出这个问题，包括孙总在这儿搞幸福企业的论坛，像富士康一连十几跳，虽然苹果是最受欢迎的，但这是建立在员工不幸福的基础上，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讨论？中国的现象大家谈到了很多，但能不能有一个东西让大家聚焦在这上面，可以引起大家的深入，引起大家把这个讨论深入，推动我们、改革我们比如执政的理念、执政方式，包括刚才大家谈到的没有参与感，包括民主法治的建设。其它话题可能比较敏感，这个话题不太敏感，这个话题可以深入探讨，所以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所以希望大家更多提建议，作为一个新的观念或作为未来政府的一个导向，同时包括在媒体上、在论坛上、在我们的研讨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

中国确实处在一个转型的很微妙的时期，很危险的时期。现在处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处在微博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瞬间传遍的时期。很奇怪，讨论一些很荒谬的东西，全国上下在讨论，不管作为知识分子也好、学者也好、专家也好，能推动一些关注的重点话题，引起大家能真正聚焦，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话题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来讨论。

提几个建议：首先，能不能提出一个建设幸福中国的概念，毛泽东原来东方红里就有他为人民谋幸福，这个事也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但为什么要重提建设幸福中国，这个比建设一个 GDP，说建设我们是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个更贴近老百姓的思维；第二，如何建设中国的幸福观，今天的讨论会也是幸福观的建设，它跟老百姓和普通人的生活贴的更密切；第三，在政府官员的考核里淡化 GDP 导向的考核，加一条幸福导向，就是当地的人民幸福不幸福，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价值取向。第四，甚至可以提出幸福国际，我们现在好像很不和谐，在国际上很孤立，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出现别人经济不好我们受益，这已经是不可能的，在价值观的建设上，包括国际化的角度上，能不能提出打造幸福国际，尽量减少国际比问题，比如非洲问题，从一个更大的战略上提出中国的思维理念，当然这有点抽象。

我们奥运会的理念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什么不能打造一个幸福国际。从幸福世界的角度来看，从这个反推，要找到一个幸福世界，是不是要找到人类幸福的共同规律，要找到人类幸福共同价值，包括普世价值。这种问题提出来会引起反思，会引起思考，会推动我们往这个方向上转变，提出幸福国际总比提出共产主义要好，更能找到大家最大的公约数。今天谈了很多幸福微观的问题，但幸福宏观上要建立一个理念，建立一个政府的导向，可以起到参考的作用，我想幸福国际大会可以在这方面做的很好。

从积极心理学看幸福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主任 彭凯平

提升国民的幸福应该是我们中国政府一个比较新的发展理念，这个理念以前提的很少，从 2007 年开始不断见诸于我们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以及政策工作报告，对这个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不光是一个民生建设和政策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文化、心理、法制、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个问题是我们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政府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社会有一些新现象是以前没有的，现在开始出现，中国人现在用心沟通的越来越少，农村慢慢在消失、消亡，全世界现代化普遍现象我们中国人也在走。

社会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影响到我们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体制的问题，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其实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这个规律有人提出来了，叫做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除了自然的问题、资源的问题还有许多的问题叫心理问题，叫做 3000 美金的心理阈线，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在 40 年代提出来的，3000 美金是一个现代化的标志，我们中国进入现代化是 2008 年，人均 GDP 正好是 3400 美金，美国是 1962 年进入的，英国是 1968 年，法国是 1972 年，而这些现代化国家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叫做现代问题，现代问题体现在资源的困境、社会的困境和心理的困境。

第一个标志，心理问题取代心血管疾病成为健康第一大杀手；第二个标志，社会身份认同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以前是衣食住行的小康水平的问题，在到了 3000 美金以后国家开始关注我是谁这样的身份问题，接着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问题就会出来，国际竞争、国际人心的变化就会出来。美国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生，大概花了 15 年的时间才把社会的心态变得理性和谐，中国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人不知道，美国总统有自己的治国秘密，从肯尼迪总统开始，1960 年他当总统正好遇见了现代化问题，所以肯尼迪总统是第一个邀请了心理学家做国策顾问的美国总统。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有 29 位心理学家，有 3 位是我密歇根的老师。所以利用心理科学来管理国家是美国总统的治国秘密，这是时代周刊 2009 年 4 月 2 日揭露出来的一个事实。

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有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自私自利的倾向、自私的基因，现在发现完全是一个虚的假设，人心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积极、正常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积极心理学有几个建议：

第一，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现在问中国老百姓全都不知道，八荣八耻，这不是核心价值，这是工具、手段，后面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其实要去看中国的历史、文化就知道，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就是“心”，而且是心理的心。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关键就是正心，这个“心”非常重要。要从心开始、正心开始普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鲁迅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就是他发现光有好的身体、光有好的医学科技，没有“心”是没有意义的。清华大学请施一公教授回国给他两个亿，请我组织心理学的复建给我两百万，差别很大，为什么？他们说石老师可以创造出好的药，我就开玩笑，我说你这么好的药，这么多钱造出来，最后用不用还是要人来，人心不在，其药何为，不会用药、乱用药，这比没有这个药伤害更大。所以我经常讲我们要重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心理建设其实比医学建设更重要。

第二，中国人受进化论的误导太大，政治考试中有一个题目，叫做马列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是什么，大家说进化论，进化论讲的就是自私基因。人的进化是由什么决定的，人为什么生活，就是繁殖和生存，这全是基因的问题，西方科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全都是对人性的错误假设。重新解读进化论就会发现，其实人是追求积极的，我最近完成了一个工作，就是比较一下人和动物形态学的变化所引发的心理的变化。这是形态学的变化，大概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我们的大脑比动物要大，我们的体态是直的，我们裸露的皮肤比较多，我们的手臂要短，我们女性的骨盆要窄，这就说明大脑聪明的人会学习、会创新、有沟通能力，因为大脑里头最大的部分是语言功能，人喜欢有责任、爱心、负责的人，这都是积极的心理。有人做过研究，由两个母亲抚养一只小猴子，一个给奶，一个给爱，你可以看见小猴子长大了以后，绝对不是有奶便是娘，而是选择有爱才是妈。所以爱是人的积极天性。

第三，创新和幸福是紧密相连的。现在国家特别提倡创新，再过 15 年中国就是世界老大，老大一定要做老师，一定要有贡献，一定要有话语权，不能再做学生，以后中国人真的不能学别人，得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得创新，创新怎么做？心理学研究发现，只有在积极地情况下人才可以出现创新的思想，愤怒、焦虑、抑郁，只能使批评更强，咆哮更强，物质的思辨更强，有积极的心绪人才能有创意、才有开发的思路。所以创新和幸福是未来政府发展的两

个重要的智囊。中国下一步发展只能走幸福和创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几十年现代化国家发展路径指出来的基本方向。

积极心理学还有很多的建议，关键就是要知道第一，追求幸福是人的积极天性；第二，幸福是可以随时体验的，生活中可以体验到幸福，我们把它叫做福流的体验。这个福流的体验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做合适的停降就会发现，大概在大脑的前额叶左边就有一个幸福中枢，右边是悲惨中枢，人的幸福是物质的存在，而且有外在的身体反应。主要有三个指标：第一，你的胸膛要发热；第二，你的嗓子要发紧；第三，你的眼睛要流泪，幸福的感受和感动的感受都有心理学的证据。跟人的幸福有关的还有情绪反应，已经发有些道德情绪像感恩、仁爱、崇敬等等都跟人的幸福有关。以前心理学家不知道人身体正常的迷走神经干什么用，只知道它是呼吸与消化的关系，现在发现其实有跟幸福积极的关系，因为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迷走神经是张开的，特别痛快、宽敞；如果悲伤的时候，就会压缩、紧迫、苦闷，而这个跟我们生理反应一样，你看见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第一反应是好，这么喊实际上是迷走神经张开；看见一个不好的图你的迷走神经会压缩，所以你是要低头的，抬头只会喊好，低头就会有不良的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所有崇高、伟大、有道德的事情都是高高的，庙修的高高的，教堂修的高高的，庙都在山上而不在峡谷之中，这都有心理的原因和证据。这些道德情绪都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雷锋叔叔为什么做好事，为什么记日记？其实就是他追求幸福，因为我们发现，作为从南方农村来的孤儿，他只有 1.61 米的个子，如何创造幸福，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他的秘密就是与人为善。积极心理学还有很多创造幸福的方法。

幸福的整体经济学框架

万国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客座教授 孙立哲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有人说社会发展目标是稳定，稳定要花很多钱，这是不是我们的目标，还是一种状态？那么这状态背后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要稳定什么？真正的发展目标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一种利益或者不能持久的利益为基础？这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有人说发展是为了 GDP 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那 GDP 发展当然就是经济发展的指标。现在大部分看到的是 GDP 的发展与人的幸福感的失落，或者人的主观的、感受的困境。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谓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的分离现象，是不是能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问题？第一，经济学历史上一直是作为关于稀缺的学问，就是到底稀缺是什么，其实它是研究这个。如果稀缺的东西是物质、是产品，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亚当斯密或者传统的经济学就很有道理。换句话说，他的满足感、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函数的更有效利用就可以结合的比较紧。

假设现在的稀缺实际上是价值观或者道德感的稀缺，或者说公共道德的稀缺，那么我们社会发展的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转型，应当说是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看传统的经济学很多测量的指标上是失效的，有的指标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大家不一定愿意，这时候的幸福感就代表了价值观的变化。所以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人的价值观的学问，而不是研究一大堆生产函数的学问。如果产生幸福，它的积极情感是怎么产生的？自利本身实际上不产生情感，情感一定是及他的，没有他人，如果不及他，是自己为自己，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情感。所以说利他假设加上情感假设，应当和自利假设和理性假设配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整体经济学的框架，而整体经济学的框架是不是能够更好地反映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充分理性的，但很多的时候是情感化的。比如得了癌症以后，很多健康决策是非理性的，他在理性的角度上看可能毫无价值，人快死了，但是愿意花特别多的钱延长生命，他已经对社会的理性价值非常缺失了。这个时候他产生的外部心理价值是最高的，人活着不完全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像这样的一些思路让我们思考怎么样看我们价值的改变，怎么样能够从幸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的未来。

什么叫幸福。幸福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自己的第一个想法幸福是个性的，如果幸福用统一的方式能够测量的很清楚，那其实它更可能会代表一部分人幸福，很多人都不幸福，或者这个幸福实际上是难以平衡的，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再分配的问题。每个人如果建立自己的理性框架，建立自己的行为边界，在行为边界上进行自由的追求，就可能在自己的

主观建设体系之下追求到自己的幸福。马上出现第二个问题，我们社会是不是允许或容忍这样多元的价值选择，允许不允许实际上主权是属于自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的权利，这就变成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政治问题，那就需要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国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公共政策的环境，使人们的自由追求得以一定的实施。

再返回到人性，我觉得经济学历来有这样几种看法。所谓 XYZ 理论。有的时候是人性为私，这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也有人说人性实际上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在很多时候人性是为恶的。我自己对这个东西的解读，我觉得它都是人性为私。人性为善、人性为恶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多年的或者是上亿年的人类文化的传承所固化在人类基因中的内部能力，其中的积极心理学是这种能力的表达。换句话说，利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思路就能看出来，人们在适当的社会环境、公共政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建造的体系之下，人们有可能把内在的积极因素启发出来，能更多的与人为善，更多的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这个时候当你为自己、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那我们所看到的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社会很多的问题就有可能有一个新出路。人性为恶也是人性为私的衍生品，当人性为私的时候或者在争夺价值的时候就可能以恶的方式、侵犯他人的方式来取得自己的私利。当人们看到我的生存是更多的依赖大家、社会、别人，大家只有在一种团体的、整体的、社会的综合的协调之下，才有可能有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机会的时候，人们的善念、善心、善行就可能启发出来。

而这种人性为善是人在积极因素引导下的内在潜力，这种内在潜力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基因和文化中，这个文化应当是普世或是整体人类形成的与自然界斗争，或者与自然界共存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潜力。如果我们社会如果能够有助于启发、发扬这样一个潜在能力，不但有理念，而且有行动方案，那就可能使我们社会发展朝着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提出了爱的问题，当然人是不是天然就有爱，这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其实爱更接近于神性，你说人完全无私，这点其实很难，但是人通过向善、文化的演进，我们应当可以看到人实际上是逐渐的在产生着爱、依托着爱，而且无限追求爱，几乎是一个神的代表，人们可能说我已

经爱了，不可能在爱的状态之中就到了完美、完善，它是永续的、永久的一种追求。如果我们这样看待人性的话，也许我们在讨论幸福观、未来发展的时候就有一个相应的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

幸福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贡献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钱镇

现实状况，中国现在这些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是蛮大的，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幸福感不是很强，有的人幸福感可能真的很强。你想在改革初期，80年代我们上大学，经历了一种思想启蒙运动，从以前的迷失、盲目彻底走出来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想60年代、70年代很多人不明不白的死掉了，为了捍卫一个所谓的革命路线就死掉了，两派那么火拼，那他们的幸福感是什么？上山下乡一批人，有些人回城了，有些人在农村一直待下去了，他们的幸福感是什么？我们上了大学，有了思想启蒙，工作之后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识高的人得到了相应的收入待遇，那这些年知识的繁荣发展，包括刚才讲的“千人计划”有计划的痕迹，这可能有它的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千人计划”吸引了一大批社会科学学者。以前我们引进的学者多数是自然科学，现在一批搞自然哲学、搞哲学、搞文学、搞历史的人，你不用足够的资金去吸引来他那可能他不会来。作为一种权宜之策，眼前现实可能的政策吸引这些人来推进国内人文学科建设我觉得是很大的贡献，将来制度变革更好，不用更高的收入吸引人更好，在达不到的时候用这种政策我觉得是很大的推进。

研究经济心理学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突破。因为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发展一切都可以解决了。除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其他学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我研究民主理论，其中一个学派就说，只要GDP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民收入达到一定的程度，民主化自然而然就到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直接因果关系，中间有很多其它变量因素，包括中东的石油也好，包括官员腐败用金钱贿赂等，都可能阻碍和扭曲民主化进程，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讲经济心理学，从心理角度讲强调人的能动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和非决定的关系，他们之间

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经济基础本身很重要，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是不重要，马克思本意讲，人全面自由的实现其实已经很有以人为本的含义。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能导致对人文学科的忽视。这个忽视从建国以来就可以看到，自然科学在保留，文科大大被压缩。改革以来，凡是涉及和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科可能还得到了发展，包括经济学、法学这种工具性的得到了发展，更强的带有价值观念的人文学科可能发展还重视不够，他自由的空间、财政的支持、社会动员的背景都远远不够。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从改革开放以来推广市场经济，经济学家一展手脚做出贡献，法学家对依法治国做出贡献，现在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其他人文学家也有更多的空间在社会里做更大的贡献，我认为这是社会非常大的进步。不走出这个瓶颈，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很难实现文明、现代化或者幸福感。有这么多学者做这个研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迹象，而且学界、官界、商界有这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商界的人智慧和判断力并不在学界之下，这点对学界也是个冲击。你不去和“千人计划”这些学者进行沟通交流，你不更多的琢磨现实问题，有更多的思考，你的学问可能还不如商界和官界的一些人物。所以我想从幸福感看，作为学者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是蛮幸福的，你自由讨论空间比较大，获得的信息比较多，能见到的那些人，能交流沟通的对象也宽泛的多，我觉得这个幸福感是蛮好的。

过多的幸福感依赖于经济增长、生活富裕，导致一个很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人们的幸福不全在于物质的享受，还在于是不是平等，是不是有机会，是不是平等，是不是有一种更高的追求。社会这几个阶段的演变我觉得它导致了现在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偏差，其实这种偏差存在问题也有一些好的迹象。问题一是社会体制问题，还有一个是形而上学的追求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我觉得作为无神论国家，我们不去强调死后是否有天堂、因果报应，但我们是不是能超越物质利益上的追求。像史铁生，史铁生他本身不信哪个宗教，但是他不是没有灵性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构成当中并不是一直幸福、一直 Happy，但他经过了那个体验后获得一种深层次的愉悦。这个数量是不是可以统计？我觉得是可以度量的，但数量和质量不太一样。有的人在这过程中开始并不那么快乐，并没有体现到太多的

幸福，他会焦虑、会烦躁，但一旦走出去后，那种愉悦幸福可能远远超于看“快乐女生”等的幸福，所以这种深层次的幸福获得可能就不是浅层次东西。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价值观上做一种思考，未来中国可能的贡献。中国是一种地域大、人口多的国家，国家里既有西藏自治区，又有新疆自治区，一个无神的国家里既包括藏传佛教的地域，又包括一个人口非常多的伊斯兰教的领域。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我们在帮助他们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很多人去西藏并不仅仅看自然景观，也是一种心灵的启迪，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比较公平的、客观的、带有一种敬畏心理去理解藏传佛教僧人是怎么体会人生价值，他们怎么看幸福感。伊斯兰教在西方 911 后有妖魔化，实际上伊斯兰教对人类也有贡献。那他们怎么看人生，怎么看价值观，怎么看幸福感。当然除了可以和世界几大宗教交流外我们还有东西方两种文化，就是儒家传统里怎么看人生，怎么看价值观，怎么看幸福感。所以我说未来中国在幸福感上、在价值观上既可以有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当然也包括基督教，民主与科学的背后暗含着信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基督教和西方那种社会体的构建是有内在联系的。

未来价值观的冲撞，不同文明的互动在中国的土壤上都有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又等于说 100 年前我们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又摆到面前，就是五四时期中国经济该怎么走？我们怎么看传统？是把它当成一种包袱、一种负担完全抛弃掉，还是从中获取一些好的因素，像抽象继承或创作性转化，那对不同的宗教传统的东方社会具有很强的包容力。一个人可以同时对不同的宗教出入期间，那么当代中国人是否有这样足够的包容力？我们作为不信仰宗教的人对宗教的东西能不能有足够的理解和沟通，我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的理念、境界、贡献就可能超过西方人的想法，对人类社会做出独有的贡献。

幸福是可以预期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翟宝辉

我是搞城市建设的，分到了一个宏观研究城市的单位，具体说就是城市运行需要的架构怎么规划、怎么建设，然后让大家满意，持久的满意就幸福了。咱们就说住房问题，这是建

设里很重要的一大块，在架构的平台上把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建起来，这个过程大家都经历了。以前是计划经济分房，有权的人玩一点手脚就造成了一些人很幸福，一些人极度不幸福，最后发展到要把房地产企业培养起来。初始阶段是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盖房子，单位可以盖房子、军队可以盖房子，等房地产企业游离出来，进入了一个用市场化的手段给大家提供居住空间的过程。

市场规律也可以逐渐满足大家对居住的需求，实际也是体验幸福的过程，每个人像您刚才说的可以有预期有把控，比如我当时分到单位，我住在筒子楼里，我可以估计到结婚那一天一定会有一个房子分给我，因为当时单位基本上都是这样承诺的，所以我会有一个预期几后结婚时有个房子。后来市场上我攒到那么多钱也可以买到房子，可以有预期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比如过度强调经济适用房时，忽略了对市场机制的培养，过度强调市场机制时，忘了还有一些人没有钱进入房地产市场，实际现在廉租房出来都是在补这个课。

有一些过度自由的东西，引起了人们对市场的预期，比如大学生毕业后不管谁的钱拿过来都要搞一个 130 的房子，这个预期会造成把你本来要在 10 年或 15 年释放的需求在今天释放出来了，需求大了供给还是那样，那自然就不平衡了，这种心态自然就受到了影响，价格自然会暴涨，价格暴涨也是一个经济学行为。这个房子值 500 万，你有一种幸福，那没住进来的呢？他就很纠结，他不幸福感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城市是在平等平稳运行前提下，政府要做的是给他的预期不要太美，美国人讨论城市规划时就讲，说你们提出 20 年的目标简直就是天堂，你把人都鼓动到追求天堂的生活，但你五年或十年又满足不了他的要求，那他自然就有落差，所以政府要做的就是降低目标的完美度，在有限目标情况下，有限的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时间，这样降下来给老百姓一个理性的东西，稍微能契合一点，这样大家的幸福感会提升的，我同意持续的满足是幸福，但持续的满足是由一天一天的满足累积起来的。

我记得中央电视台曾采访过一个 96 岁的美国人，红光满面的，说你为什么能这样，他说我就是一天一个目标，当晚上我去考察时我发现我的目标实现了，我就非常开心，每天这样累积起来我的日子是很满足的，持续满足就是幸福的。

幸福需要心理健康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教授 樊富珉

我研究心理健康、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想谈一谈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和治疗，但时间不够我就直接进入建言阶段，刚才来自不同领域的，有经济的、媒体的、商业的、住房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发言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启发很大。

其实幸福、谈幸福观、幸福感其实是不同的东西，今天谈的比较多的是中国人的幸福，幸福不幸福是一种状态，幸福观就是中国人怎么看幸福，什么是幸福，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心理学的研究和其它的学科不太一样，心理学相对比较微观一些，所以心理学上讲什么是幸福主要讲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讲的是对现在生活满意状态，也是一种心态，刚才讲的积极情绪也是一种感受。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研究的是心理学，尤其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我的建言有三个：

第一，应该让关注心理健康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虽然这些年政府对心理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尤其在和谐社会的决定中特别把全社会要关注心理健康纳入到文件当中，特别要建立心理健康的网络，健全心理咨询等。那从政府的角度是有这样一个文件或口号，但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当中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给大家一些数据，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中国人口很多，这个研究也比较新，全国的统计数字非常少。卫生部曾公布过这样一个数据，13亿中国人当中有1600万重型精神病，那是要住院、吃药、系统进行医学生物学治疗的，有8400万需要进行心理治疗的人，1600万和8400万也就差不多是1亿人。现在精神卫生法已经在人大二读了，有一个争议是精神卫生法到底是为1600万人服务还是保障，还是关注到8400万，还有人说不但要关心8400万还要关心全中国人民。因为健康本身就包括身心的健康，那心理健康是更重要的，如果心理不健康人会得病，思伤脾、忧伤肺、喜伤心、恐伤肾、怒伤肝，《黄帝内经》讲人心理不健康会得病，身、心是不可分的，心理健康就可能战胜这些疾病，可以长寿。

还有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自杀率，这些年媒体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做过不少研究是关

于大学生的自杀，这些数据跟国外比不是第一，但也很敏感，卫生部公布的大概是十万分之16，自杀率都是按十万分之作为基数来谈，大概这种数据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还有一个数据，从1982年、1993年、2005年也就是20多年间中国的三大类主要精神障碍的发病率来看，重型的精神病，就是精神分裂症变化不是太大，当然也是有成倍的提升，情感性的障碍比如抑郁症大概是1982年是0.04%，1994年是0.05%，变化不大，但2005年是16%，你看到那个点一下直线就上去了，神经症比如强迫、抑郁、焦虑、神经衰弱，这个发病率也是非常惊人的，呈十倍以上的增长，所以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需要引起更大的关注。

第二，心理健康不仅仅是要关注心理疾病、心理障碍，更要关注心里没有障碍的人怎么更健康的发展。国外一个积极心理学家，他本身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长期关注怎么预防心里不健康，治疗心理疾病。他提出心理学原来有三大使命：第一，让不健康的人变得健康；第二，让天才尽早被人发现，得到培养；第三，让普通正常的人过上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二战后因为心理问题特别多，人们都在关注这些问题，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偏向，就是14篇研究问题的，什么焦虑、抑郁等的论文出现，只有一篇研究快乐、积极、正向情绪的，所以人们太关注那些疾病的问题，让心理学变成了一个疾病取向，所以他说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积极正向的，让普通正常人过上更幸福的日子。他研究并创造性的提出人类除了心理疾病诊断手册，还要有人类优势的手册，他提出了人类6大类24种良好的积极品质，比如感恩、好奇心、创造力、乐观等的感受，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从对疾病的关注转向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创造力的培养，关注人的正向、优势、优点怎么能更好被开发出来、提升出来，被更好的发挥出来。

第三，心理健康的服务应该更加专业化，更加方便化，现在说实在的，我们常常碰到的抑郁症、焦虑症没有地方去，就是他到哪儿去寻求帮助？去精神病院挂号很难，而且也不愿意去，好像一到精神病院就被污名化，所以在服务他们这方面需要更加专业化和方便化。

不幸福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义平

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2007年4月27号我在《人民日报》曾发过一篇文章，叫《幸福的经济学分析》，我先简单念一下：“幸福是一种主观评价。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感觉来自充足的食物、清洁的用水、快捷的交通、便利的通信、多彩的生活等等。一般来说，发展比不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然而，面对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为什么还有人不同意，甚至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呢？从经济学角度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虽然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却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最初的经济增长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据两位瑞士学者的研究，从1946到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生活必需品的档次大幅度提高，这种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却伴随着平均幸福水平的略微降低。如果以3分计算的话，那么1946年的幸福水平为2.4分，1991年反而降到了2.2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会自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欲望和期待。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期待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看到简单的电视节目，就会觉得很幸福。然而，现在即使家家都有了彩电，甚至有的家庭还不止一台，但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增加多少，人们对电视节目的抱怨反而更多了。再如，在经过长期“大锅饭”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奖金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幸福感；但在20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对奖金习以为常，奖金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已经大大地减弱了。这表明，人们的幸福是无止境的，有了新的起点就会有新的期待，而期待与现实情况的落差就降低了幸福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会有新的期待，那么，继续发展经济能解决人们幸福感降低的问题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但不能完全解决。因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除了物质财富，人们还追求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拥有物质财富不等于实现了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如果这些非物质追求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幸福感就会降低。

还应看到，对人们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而是一个人与别人特别

是与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哲学家罗素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又喜欢亚历山大，反正喜欢比他们更伟大的人。然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传说中总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过去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现在我们虽然住上了瓦房，但我住的是瓦房，你住的是高楼，我的幸福感可能不但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这就会导致“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这些现象或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的。那么，解决的途径在哪里呢？是进一步的公平。我现在还有几个感觉，经济社会、社会发展方面的诸多问题带给人们的幸福感确实降低了，而不是提升了。

第一是我们的生产目的，生产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上到下上了很多项目都是为了片面的追求 GDP，GDP 的追求早就受到了人们的谴责。念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比我说的更权威，1973 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写过《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他认为经济发展忽视了人们的公共目标，忽视了人们的幸福，转向了专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成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的关心，对物的追求超过了对人的关心，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从商品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氡对视力的影响，制钢厂对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的影响。

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曾举过很多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是上一个世纪 70 年代，美国一个 40 多岁的人非常羡慕中国人，羡慕中国人骑自行车，呼吸新鲜空气。曾几何时，中国人也不骑自行车了，也没有新鲜的空气了。再加上地方政府片面的追求 GDP，上了很多污染的项目，都不知道什么被污染的地方癌症越来越多。印度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就说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代替了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生产目的到现在都是这样，你不要看 GDP 增加了，很多 GDP 是没有效率的 GDP，很多的就业是没有效益的就业，因为这个企业的产品本身就是卖不出去，在这里工作的越多损失就越大。这是一个，我们应当端正社会的生产目的，从上到下依然是这么一个生产目的，依然是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下来就不择手段、千方百

计了。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第二，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严重失衡。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结果是社会保障跟不上，社会保障跟不上，教育等跟不上，人们缺少安全感，没有稳定的保障，大大的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

第三，在这个社会中不知道怎么了，人们的欲望被越忽悠越高，整个社会都比较浮躁。我曾在陕西卫视做过一次节目，是一期房地产的节目，大学生被忽悠的一毕业就想买房，一买就想买一百多平米的房，当这些房都买不起时，心理落差就很大，就不幸福，就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

第四，公平和机会的缺乏。现在很多地方教育没有公平可言，就业没有公平可言，拼到关键时不在你考试考的怎样，关键时候最后一关就是拼爹。而且社会分配不公正，有很多行业一般人进不去。所以真正的幸福在于公平，有了公平人们在心理上是平衡的。幸福就是心理上的平衡。有了公平的机会，剩下就是自己怎么干的问题，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第五，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特别小。官本位害死中国人，官本位本来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反映，是一个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那个时候重农轻商，重本抑末，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只有一个，然后学的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念八股科举考试。那时候还有个科举考试，还好一点。到了计划经济也是一个行政等级，所以搞官本位还情有可原。市场经济是一种横向联系，要发挥人们的比较优势，再搞官本位就不行了，远远脱离了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市场经济的要求。现实生活中升迁艰难升职无望的官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幸福感。

另外城市化模式带来了极端严重的社会问题。盖房子的城市化带来的消极作用极其巨大。城市化本来是江浙一带由产业集聚、由产业拉动、由人集聚这么一种自然而然的城市化。另外一种就是一条大马路两旁卷帘门式的城市化。圈地，让农民进城打工，造成了农民严重的流离失所，也导致了城市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找不到工作，现在第二代农民压根就没法回去，没有地了，农村也是严重失衡。妇女留守、儿童留守，然后城市里再加上这么一个对比，

心理越来越失衡。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么一个城市化的问题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些社会不公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幸福感就会减低，社会稳定问题就难以解决。

有些项目的政府津贴，我觉得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动辄就靠政府的判断给津贴，好像家电下乡一样，用全国纳税人的钱支持个别企业，本身就导致了不公平。此外，津贴只能给钱，不能给机制，不能给环境，实际上机制和环境比钱更重要。前一段时间，深圳市给吸引的所谓的人才以住房补贴，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事实是如果这些人才在深圳发挥不了作用，实现不了自我价值，补贴的钱再多可能也不会去。发达经济国家并没有计划经济式的补贴，但却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他们靠的是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吸引人、造就人、留住人。40年的计划经济使计划经济的思维根深蒂固，经常会在不经意的过程中以各种形式顽强的表现出来，我们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

幸福的度量与幸福感

中国银监会培训中心副主任 陈伟钢

幸福感究竟是什么，我自己感觉到幸福感就是一种人们的心理感受，刚才彭老师也讲了它就是一个心理感受，幸福感没有太多东西去衡量，不能用物质衡量，有些人物质很丰富但也不能幸福，也不能用环境衡量，他住在很好的地方也不幸福，也不能用现代化衡量，现代化的城市有现代化的设备他也不一定幸福，更不能用GDP衡量，那幸福感应该用什么衡量？我有这么两个观点：

一，**幸福感是个体追求的一种快乐，或者说快乐的去追求就是幸福。**所谓快乐的事情，比如我们同样去香山爬山，有的人为了锻炼身体为了玩去爬山，有的人到山顶上去捡垃圾，把这项工作做了，走了同样的路程可能玩的人感觉更幸福，被派去工作的人他感到是去完成任务，他的幸福感没有自觉玩的那个人幸福。我们平时小孩玩游戏机，玩到天亮他不感到很辛苦，让他做作业到天亮他会觉得很辛苦，他自觉自愿的追求这项工作那他就是幸福快乐的。

二，幸福可以用数量去衡量。幸福感是他实现了的价值和他期望值的比，我实现的值和期望的值如果这两个相等，或实现值略大一点，实现值比期望值小于等于一，他就是幸福的，小于一他就感到不幸福，这个数越小他越不幸福，那这个期望值又是怎么取？期望值跟社会的平均水平有关，比如这个办公室的人都是一个月一千块钱，那这个平均水平就是一千块钱，他的期望值基本上是比较这个水平多一点点，多多少？我今天要引出一个数字，叫黄金分割点——0.618，就是比0.5多一点点。这个数是几千年前人们发现的，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一个没有解开的谜。0.618就是把一个线段分成若干份，有0.5、0.618，这个线段是一米长的线段，把从0到0.618这个线段比上1米，这个等式就是0.618，这个0.618计算出来非常容易，但这个点为什么来有很多学者研究，我今天不说，我今天就讲0.618对幸福指数的关系。

我们讲幸福感实际上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哲学，中国人有多种哲学的立命，一种就是0、1哲学，0、1哲学是要么是0要么是1，就是很极端的，0、1哲学就是极端哲学，就是说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去干。用李清照的话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用曹操的话说就是“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蒋介石也说“不成功则成仁”，毛泽东说“或者重于泰山或者轻于鸿毛”，是非常极端的。第二种哲学是半半哲学，半半哲学就是不求进取的，就是在0.5那个地方，就是左右飘忽的，就是得过且过，拿不定主意，进退为难，左右为难的哲学，这种哲学是非常不好的哲学，就是人没有主见，没有主见人就没有幸福感，他可能会浪费很多时光，错过很多机遇，不进取。最好的哲学是0.618哲学，0.618哲学就比0.5多一点点，它多0.118，这个数是非常准确的，非常有用。

提到人们的社会平均期望值，比如在座的人都是1000块钱一个月，他的期望值是比1000块钱要多一点点，多0.118，就是说可能1118块钱，就是比平均水平要高一点点，他得到高一点点的水平就非常幸福，就有幸福感。0.618我们把它叫做黄金分割哲学，人有这样一个思维后，他就说幸福感是他比0.5多了一点进取，他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我是进取的，但是进取的速度不是求极端，而是求比平均值多一点点。就是他是积极的但不是极端的，他是求进的但不是激进的，那他就是幸福的。我们作为媒体、作为社会应该向老百姓倡导什么样的哲学？就是0.618哲学，就是要提倡这样一种价值观。你不要一毕业就倡导有车有房，

那引导就高了，我们要用平和的心态引导老百姓，老百姓并不是说你给他多少钱就幸福了。在宋朝、唐朝没有现代化、没有 iPhone、没有电视、没有火车、没有飞机也很幸福，幸福是跟现代化没有关系的，跟经济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他就是一种感受。所以幸福感的研究我觉得就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对社会上的人都去引导，让大家追求一种平和、祥和、积极但不激进的社会心态，整个社会就会有序，大家就会有幸福感。

幸福的时代感很强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中国首席经济师 陈兴动

毫无疑问今天很难说中国人是幸福的。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痛苦的。刚才讲幸福是很个人的，是每个人的感觉，但关起门来你自己幸福，开了门后你不见得是幸福的，可能每个人都是痛苦的。你的感觉和自己的昨天比是幸福的，你跟父母亲比是幸福的，你跟很多人比是幸福的，但当你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使你可能有许多不幸福的一面，所以总体而言你可能很不幸福。像北京大塞车，交通堵的一塌糊涂，你幸福吗？开车幸福吗？有车觉得幸福，但你看骑自行车的人，开着车你觉得幸福，你就认为骑自行车的人不幸福，可骑自行车的人呼呼的从你跟前走，你单位的员工问你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我已经工作一个小时了，你幸福吗？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很多地方不幸福。

2010 年以来，作为商业经济学家我观察的现象是中国人全民焦虑，许多地方不像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这么好，也没有自豪感等东西但他们很幸福。你去台湾的四大名山去看看，那里很多人在做善事，很多人每天祷告，你问他们幸福吗？很幸福，幸福是什么？吃得很清淡，粗茶淡饭，做的是为别人的事情。比如中国的地震，他们会把一条一条的毯子从各家各户收来，或者收钱扎边，一包一包洗干净了打包寄出去，一天四五点钟起来感到十一二点钟睡觉，你问他们幸福吗？他们说幸福。

经济增长到今天，30 年前后作比较。前几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学典礼时，我作为毕业生的代表之一被邀请回去，回顾一下 33 年以前我也曾是懵懵懂懂的进了大学，那个时候的经济学院和现在物质条件那是天壤之别。我们作为商业经济学家来讲每天想到的东西是中国经

济如何发展，比如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困难，短期尤其最近经济学家担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真的出现拐点了吗，30 年以来的高增长是否一下就过去了？那如果这种增长真的过去了中国人觉得未来是什么状态？比如中国现在人均 GDP 不到 5000 美元，我们经济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旋转，结构问题导致中国经济不能再发展了。很多人问我中国要追求 8% 以上的增长，为什么不可以是 4%、5%？像欧洲的经济增长是 0.1%、0.2%，日本现在算未来十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是 0.1%，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有人说是 8%，最近大家都在讨论，8% 没问题吗？我们再算一算，中国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压力，压力是我们经济增长能不能在某一个时段出现经济增长完全现代化。比如工业化完成，城市化完成，农业现代化完成，科学技术发展要达到一定程度，在之前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未富先老，现在完全有可能，我们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到 2030 年或 2035 年之前如果没有完成这“四化”就完不成我们的经济增长，所以领导人有他的压力，领导人要达到这目的有许多的东西需要考虑，最后把这些政策考虑进去，最后得到的结果可能使许许多多的人不高兴、不幸福，那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

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对幸福的追求发生了根本变化。幸福感是时代感是非常强的，而这个幸福感的时代性我们更遇到了一些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比较，我们是横向比较的。现在 80 后、90 后这一代能跟我们一样吗？我和我的父辈有代沟，那我儿子和 80 后、90 后出生的孩子和我们的代沟要更大，未来的情况是父母亲看不惯我做的事情，未来我更看不惯我孩子所做的事情，这种看不惯就使中老年人产生了一种不幸福感、痛苦感，除非你能够跳出来。

现在讲民主政治，如果幸福是个人的感觉，那讲一个社会的幸福感，刚才陈老师讲黄金分割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2002 年，胡、温这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当时 2003 年的三中全会上评出来三个中国施政理念。施政理念提三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什么？从政治家角度来讲，没有可能使得百分之百的人都幸福。美国现在民主、共和两党竞争，奥巴马的支持率是 47%，罗姆尼的支持率是 46%，你说这个社会是完全分裂的吗？不见得。但美国社会是和谐的吗？我们说相对来讲恐怕是和谐的，恐怕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相比，我觉得可能是最和谐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矛盾可以允许大包容。如果按黄金分割线的理论来讲这个话的话，那 61.8% 的人要感到幸福，我们允许 38.2% 的人逐渐逐

渐不幸福，但不能变成一种痛苦、愤怒、反抗。

回过头来我们讲幸福，老一代领导人提到五个需要。陈云，宋平，李克强也连续强调过这几个方面。这些领导人从整个社会提炼出了社会幸福感的可能，它是五个方面，叫少有所教、老有所得、居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领导人要做到这一点，可是我们努力去想一想，这些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这个幸福是给予的，就是政府要做出这五个方面的给予，其它就靠社会变化。

汪洋在广东讲幸福不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幸福是你自己要创造的，可见中国现在领导人对幸福的想法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所以判断一个人的幸福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但我们把它提升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如何培养让大家感到一种幸福，大概有几点可以做：

第一，幸福不幸福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肯定讲不了幸福。我最近到欧洲跑了 20 个城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方，相对来讲德国人的幸福感明显比西班牙人强、比意大利人强，因为物质的问题出来了。过去我们讲希腊人不幸福吗？我们的民主思想来自于希腊，可希腊人现在打开了窗户往外跳，你觉得他幸福吗？如果幸福就不会往外跳，所以物质是很重要的。我们经济发展肯定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发展，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和谐东西，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容忍度，刚才讲的黄金分割线，我们能不能容忍 38.2% 的痛苦以获得 61.8% 的幸福，我觉得就是幸福肯定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我们如何创造出这样一种概念出来，还有安全问题，所以第一个我讲的是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保障。

第二，时代已经发展到这种状态，全球化已经发展了 32 年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国门已经打开了，不能再像北朝鲜一样把门关上，不像 1978 年以前我们大家都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肯定不是了。因为没有在同样一个平台上的比较，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概念。民主和政治必须往前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从微观和宏观看幸福

Dechert LLP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从两个角度谈的，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我觉得幸福是个人的事，所谓你的偏好，就我个人来说小时候喜欢吃肉，那年代很少有人吃肉，大部分都吃素，而现在吃素，脂肪肝造成的，其实幸福不幸福是以个人来决定的。

昨天我跟三个 90 后律师同事探讨什么是幸福，一个人讲他认为幸福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基本的把控。另外大概有四点是一样的，幸福不幸福取决于对亲情、爱情、友情、事业是否满意，如果这四点满意他认为幸福，那两个都没有男朋友，说因为我现在没有男朋友所以不幸福。这个事可以从微观上探讨，其实不同年龄的人，或者他事业上进展不一样，年龄不一样，其实他的幸福感是不同的，对没有家庭的人来说他渴望的是家庭。

从微观上谈，很多老师谈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文革时大家都要想吃饭的问题，应该作为国策继续发展经济，并且作为主线。我们跟过去比肯定是吃的更好了，但人们的需求也更多了，一旦经济满足后，以前没有车现在有车了，没有房子有房子了。一个人是否幸福，如果从宏观上讲应该有个制度的保障，这个保障很重要的就是法律，我是律师，从这个角度探讨一下。

现在美国在进行总统竞选，奥巴马是民主党候选人，罗姆尼是共和党候选人，现在美国老百姓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不满意的人很简单，他有一个选择，他说我可以选一个在未来四年能更好领导美国的人，让我的生活得到改善，因为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很高，这点的启发是美国人选择多一些，至少可以做一个选择，可以发泄不满。我们已经有一些村里推行选举制度，这个制度本身至少给普通百姓一个参与管理的机会。第一点建议就是选举。你幸福不幸福需要有途径表达，这个村官选出来了，他为你做了你满意的事情，实现了他承诺的事，比如村里生活改善了、房子建的多了、经济发展了，这都可以作为目标。给老百姓一个途径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愿望，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个人权利，有几件事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钓鱼岛，那是中国的领土毫无疑问，大家都很爱国，现在大家只能上网表达自己的愤怒、表达爱国情绪，但你要到日本大使馆示威肯定是不允许的，至少最近是不允许的。

我觉得可以表达，首先我认为是中国的，认为是中国的要说出来。我们宪法里有集会自由，既然宪法有法律的保障，那老百姓就应该有权力到日本大使馆门前示威，表达爱国情绪，

就是个人权利的一种表现。

还有一点就是宗教自由，宪法都有规定，都说允许信仰宗教，其实现在中国像道教、佛教、基督教还是有的，但信仰自由政府是不是要鼓励，比如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不是要鼓励，如果你不提倡本土文化，比如道教这些，可能过不了几年每个村都有一个教堂，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政策问题，在法律权利上是有保障的，是能不能行使权力的问题，你刚才说幸福是永久的快乐，可能生活中避免不了其它一些感受，比如释放不满，我觉得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才是真正的幸福。

细化的幸福研究

原《中国工商》杂志总编、教授 阎阳生

我研究文革，研究文革不得不研究红卫兵，研究红卫兵你不得不研究红卫兵是怎么产生的，诞生在什么地方。五六年来采访了大概上百个人，包括各种各样的老师、红卫兵当事人，研究的越深，采访的越深越纠结，不光是这个题目纠结，我接触的对象也纠结，而且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麻烦也在纠结，对于这个群体我又感到必须去研究他。以前我出了一次车祸，五六根肋骨断了，手也断了，当时清醒了以后我就想有很多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做，有些事情是不是别人做不了，我必须去做，给自己强加了这样一个命题，我现在进行的调研是名人不屑、常人又不能。

这个书很多人感兴趣，我就把它慢慢的具体化了，写一些具体的人，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很多很多使我纠结的事情，第一个人是程小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副院长和国家会计学院的院长，她应该是清华之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到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到教授，到副主任一直到院长，她也是老三届里头第一或者比较少的从黑土地东北到黄土地陕北到红土地云南的人。我研究她的时候就本身就纠结，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程小月跃入云端，她到红土地的时候给自己想了五种死法。

她在清华附中的时候是我们青春的偶像，又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后来得癌症了，立哲教授一直在抢救她，我们去了云南她去过最后的地方，她讲，如果不能跑百米，如果不能天天

登香山，如果不能打满场网球，如果不能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不能讲课，生命就没有价值了，她想了五种死法，研究了很多书籍，吃什么毒药，云南有什么蛇等。我进行采访以后，我说小月，人生最后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刚开始写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史铁生，也是我们清华附中的，他跟别的作家都不一样，他研究彼岸的问题，谈的很深，有的教授刚才讲了研究宗教和理科有什么关系，他说这特别有关系，是相辅相成。他在去世的时候我们几位同学去看他，他说你们来活体告别了，他去世以后把所有都捐献了，凌风教授专门跟我谈过，最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尊严的去世，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以后，大家全体向他鞠躬。我写了一个“史铁生透析生命”，他对生命的感觉已经不是一种感觉了，他走的时候一切都定了，安排好了，他最后是幸福的，不管他做了什么。这时候我就感到老三届这个群体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他可以派生出很多东西。前两个月我在清华讲过一次课，从组织学的角度看红卫兵、革委会，他毕竟是一届政权，包括蒯大富，人家说建校百周年，最后怎么没有我这一块，在革委会主任当政了一段时间，说不合法，毛主席任命的。所以这个群体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人家也说了，你作为一个退休的群体有什么可研究的，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很多事情跟当时有极度相像的，全民的焦虑，狂热的潜伏，那个时代经过磨练的人，可能有一些人要登上你是舞台，作为历史的主角。

基于此，从科学的角度、社会科学的角度值得研究。回到我自己这块，孙立哲教授前几天讲了一个课，他说人生有四种焦虑，一种是自由焦虑，一种是认同焦虑，第三是孤独焦虑，第四是死亡焦虑。有时候我感觉到这几种焦虑在自己身上同时存在，早上两三点钟都睡不着。我问孙立哲你感觉到自己成不成功、幸不幸福？他想了很久，因为作为赤脚医生，就为了农民看上病，他说现在感到自己不成功、不幸福，因为现在去农村看甚至还不如以前。我后来就写了一个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他有很多传奇故事，幸福不幸福，农村的生死问题，那时候都是疾病、流行病、大手术，等于几十个人排了一排让他做手术，他们的幸福观是什么，但是他最后被打成四人帮，又从舞台上给万人大会讲演，到最后成为批判对象。所以第一步如果是传奇还有一点喜剧色彩，第二就是知情偶像的城府，现在在写第三个，作为一个跨国行者的忏悔或反思，有很多想法。

有时候研究一个大题目反而研究不下去，研究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具体一点，研究一个人来说，这个人身上都提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他的幸福追求，这也是我想请教专家的，所以我把这个题目也慢慢的细化了，就是说研究一个老三届作为这个群体它的价值观和幸福感。这个题目一下子又比较大，但我想通过一些具体的人、通过一些调研的资料，把它细化，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很多人身份、地位都在起伏变化，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时候都是选择性记忆，但是北岛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集体，大家选不选没关系，只要是真实的感觉，大家的偏差结合在一块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客观的东西。

幸福是可以传染的

麦可思研究院执行院长 郭娇

我们每年都会调查超过 50 万的大学生，从这个人群谈一些发现，我们对大学生最主要的关心就是毕业后能不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这跟大家的幸福感是有联系的。发现 80%是满意的，20%不满意原因第一是不符合他们的期待，第二不符合他们的兴趣爱好。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两项是排在前面，这就说明 90 后开始思考自己期待的职业是什么样的，是否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第三点他们才提到收入，我建议是在这个题目下，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幸福感上要分开，要有不同的年龄阶层、不同的角度。

在座很多专家都是从国外回来的，跟他们直接接触是不一样的，我出去在走廊里看到一个外国的小姑娘，她可以和你有直接的眼神交流，就是陌生人而且是面带笑容的，但这种接触我们即使是认识的人也是没有的，我想说的是幸福感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它是可以传染的，从整体上来看它有一种溢出的效应。今天大家谈的这么开心首先大家认为自己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在这里交流也找到了很多共同的话题，就是整体的幸福感对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幸福和不幸福是个人的事情，但我们为什么要在国家层面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一小群人是幸福的，周围被一大群痛苦的人包围着，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表现，你想如果你是幸福的，但你身边的司机、保姆是不幸福的，所有给你服务的人他们心里都在想，今

天回去我家人是否会满意我的收入，一天开车做饭时都想这些事情，那你被这样的人围绕起来时，我就能体会陈老师说看到大家的痛苦我是不幸福的。

我们关注的是要把他从 0.5 提升到 0.5，还是应该关心那些是 0 的人，把他从 0 提高到 0.1、0.2，一个基本上觉得自己还 OK 的人他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破坏力，极端的就是那个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极端不幸福的人对社会造成的破坏非常大，而且大家会发现一种主观的，就是年轻的 90 后找不到工作，在这个年龄阶段容易产生 0 的对世界、人生的看法。所以我就想这是一个分布，大部分人都在中间，我们关心比尔盖茨这样一个已经自我实现的人，还是应该关心 0，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群。其实这个观点不是我的，可能大家听过一个虎妈的人，她对自己的小孩要求非常严格，大家看这个人的背景，她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她研究像东南亚那些国家像印尼当年的华侨，为什么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政治经济动乱环境中，在一小群幸福的人和被一大群痛苦的人包容时，就像在火山爆发的关头，如果从国家政策上来说，就是你要分析这样一个整体形势，重点在哪一部分，要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幸福需要回归信仰

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房汉廷

关注和体会、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是我持续了很久的事情。它不仅关乎自己如何看待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内省问题，也着实关乎着自己家庭，所处族群以及更大范围的幸福之源。

一、幸福感与幸福观。关注幸福，不因民族、种族而异，不因富贵贫穷而分道。所以，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是一个人类灵体特有的精神活动。如果给幸福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持续的满足感。短暂的满足可以视为快乐，只有持续的满足才能称其为幸福。

我们很多人经常误把快乐当作幸福，所以经常会出现患得患失的现象。一次愉快的对话，一顿美食，一处美景，一个美人，都可能给你带来或长或短的快乐，但这些快乐有起有落，有始有终，快乐之后或许是更大的快乐，也许是更大的失望甚至是痛苦。当下社会看到的种种苦楚或快乐，多为此类。有大房子还想有更大的房子，有了漂亮的妻子还想有更多的美丽

情人……显而易见，快乐是幸福的片段化表现，但它绝对不是幸福本身。为什么只有持续的满足感才是幸福呢？尽管幸福感是个主观的事项，似乎千人千感，万人万变，但是真正决定幸福感的还是幸福观。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幸福感。一个生活在藏原上的牧民，笃信着藏传佛教，每年把自己所得经济收入大部分敬献给布达拉宫，他感觉很幸福；一个生在北京，拥有着半个城市财富的老板，心悬着无处安放，未必会感到幸福。

由上可见，决定幸福的决定因素是幸福观，而决定幸福观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物质，有人讲是精神，这两个说法或兼容的第三种说法已经持续了几千年。物质匮乏的时候，小小的物质满足也能带来比较长的一段满足感，但一旦这种物质满足不再因匮乏而是因丰腴而得到时，满足感就会骤然下降。精神匮乏的时候，同样一缕新思，也能带来相当长时间的快乐，但一旦这种精神新思被科学证伪或被其他心思击败，骤然出现的是更大的失落甚至崩溃。中国“五四运动”造成的传统崩溃，“文革”后期产生的共产主义崩溃，以及2008年以来产生的市场精神崩溃，大致如此。物质、精神都是构成快乐的要素，但只有提升到信仰，才能够成为决定幸福的关键。因为所有的幸福与不幸，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当事人心中的那个幸福观。

二、中国人之信仰与孔孟猜想。当下中国人实在是一个可怜的群体。高级知识分子满嘴说着流利的英文，却坚决不信基督；腰缠万贯的巨商大贾，心中之佛只是自己的一个保镖；引浆卖粥者，心中所想又多为“金钱万能”。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从各个层面和每个的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心生困惑：我幸福吗？我的幸福在哪里？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盲从，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这种幸福之考，那么在中国经济急剧增长，物质相对充裕的今天，关于幸福之考已经到了空前的高点。如果社会大多数人找不到幸福感时，社会将会是多么的燥狂啊。因此，要诊治当下中国人的幸福感低下之症状，核心还是要寻找到中国人的幸福观。幸福观决定于什么？决定于虔诚的信仰，是那种笃定式的，可以是恒久不变的。惟有如此，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满足感。

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吗？中国人有过很多信仰，如自然界的神灵，天竺来的佛，阿拉伯来的真主，西方来的天主以及基督等。当然，长久影响中国人信仰的其实更多的是儒家思想，

只是在当代被遗弃了。正是这种遗弃，导致了当下中国人信仰的大缺失和大灾难。孔孟如何界定幸福的呢？他们没有直接说，但他们的说法告诉了我们信仰什么。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了“仁者爱人”，更表达了“百行孝为先”的行动准则。显然，孔子的信仰是“爱”，“爱”的行动是“孝”。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孟子·离娄上》明确指出：“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不孝中无后为大”。孔孟之说，核心是何？显见最核心之思想是告诉人们：我从哪里来，来后应该做什么，之后再到哪里去。从上述孔孟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前生来自父母以及祖上，我们的来生在子女以及子孙身上，而我们当下要做的是赡养双亲，养育幼子。

多么简单的一个人生模型。这些困扰每个人的终极问题，两位先贤很简单地就帮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前生和来生，自然也确定了我们的基本职责。这个简单的线性模型，让我们有了一份出奇的安定和笃定，即使再困难或再难受的死亡，只要看到或确认自己的来生已经存在，那种欣慰又是何等的坦然。知道有直接的“彼岸”且已经到达，能不幸福吗？即使过程看似千辛万苦，实则幸福无比。孔孟模型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爱自己和爱家人上，它还扩展到了爱家族，爱部族，爱族群等更广义上。我们不妨把这种扩大称其为信仰的扩展模型。在这个扩展模型中，同样可以看到：一个人可能与很多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前生信息，如哪一代的祖宗是同一个人，即使非同族之人也可能因为姻亲的缘故而出现了混源信息。正因为有了这种更为广泛的前生、今生、来生的认同，才会出现舍小为大，舍今为后的壮烈之举。这些渗透在中国人血液中，体现在中国人行为中的信仰，一直是中国人安定、祥和生活的基石。综观秦以来中国之社会，大凡此基石稳定则社会稳定，此基石动摇则社会动荡。

三、孔孟猜想的科学验证。孔孟猜想曾经被我们的先人们笃信不移，但其后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以来，则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第一种冲击来自各种宗教，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第二冲击来自科技。对第一种冲击，经过 1000 多年的明辩，至今尚不能说有了明确的结果，对第二种冲击，经过几百年的验证，如今可以说尘埃落定。

遗传学明确验证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受精卵（关于用体细胞在克隆条件下完成的人，本文

暂不讨论），而不是任何人外力量创造的。近年的基因学又进一步证明了人的 90%能力来自基因，10%来自学习，特别是 Y 基因可以在一个家族中的男性中永续传递。当然，如果哪个人的 Y 基因变了，那肯定是哪代老祖母跟其他的老爷爷也好了才出现这种问题。上述科学验证，明确地证明了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一套基因的传承者，在体验幸福感的时候，通常都是是通过责任和直源的传递产生出来的。这也就是一个人很自然地产生出爱自己、爱孩子、爱父母的感觉。再扩展起来，每个人对自己所属家族、民族的天然偏爱，则因为因为你和他们具有近源性和混源性的传承关系。

至此，我们是不是不再觉得孔孟猜想是空穴来风呢？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在那样一个鸿蒙未开的时代，就有孔孟这样的先贤告之了我们如此重要的人生密码，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自己身上不仅有人性也同时存在神性。集人性与神性于一体的人，还需要向其他神祇寻找神性吗？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皆是向人以外去寻找神性，而惟独儒家思想提出的神性在自我身上这样科学的猜想。中国人（主体上）为什么一直是一个与人为善、协调、爱人的民族？核心就在于这种人性与神性合一的核心价值观造就的信仰基石。观察历史上以及当下社会出现过的这样或那样的动荡时期，一个核心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抛却了这套核心价值观。而当我们强盛和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套价值观回归或者我们重新又相信的时候。有了神性，人才会塌实、安定、祥和，才会真正体会到持续的满足即幸福。

四、回归信仰基石放能得幸福之果。既然信仰是幸福之基石，而中国人又有祖宗留下、现代科学证明的天道人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弃而不用呢？用之、信之明智而幸福，弃之、妄之不智而痛苦。

为此，我认为解决中国人之幸福感淡薄或缺失之要务是回归我们的传统传统价值观和信仰，让这套被科学明证过的思想指导我们的人生，才可能真正使中国人获得大意义上的幸福。正像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说的：未来统一实世界的力量必然不是来自暴力而是来自一种核心价值观，而这种核心价值观惟有集人性与神性的儒家价值观可担当。当然，我们不是简单静止地回归传统，而是继承发展并重地传承。

心有地方放了，还有恐惧吗？人性中有了神性，幸福还会跑掉吗？

幸福的四个基础

《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石述思

首先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些勉为其难，能谈这事儿的人也只有党组织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可能有点建言献策，位卑未敢忘忧国，幸福在哪里？幸福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幸福是在新闻联播里，但是不幸福和伤痕却遍布了整个社会，这叫拧巴。不过老外来中国人说，他老怀疑咱们电视坏了，如果他晚上7点钟准时收看电视的话会发现都一样。我有一个感觉，今天谈这个话题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至少能谈幸福观的话，证明温饱都解决了，幸福是吃饱了撑着才谈的，一个人吃不饱饭，面包就是幸福，我们中国进化到今天可以谈美规了，首先还是有亮色的，我想先谈谈不幸哪儿来的，就是宏观上讲不幸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的不幸，基本都是管出来的，政府的不幸主要是管不好带来的，所以双方都很焦虑。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谈几个话题，我小时候觉得特幸福，我们家可能跟普通中国孩子一样，幸福是有条件的，我们虽然吃不太饱，但是很多人教育我们有三分之二的人挨饿，我就认为我们特幸福。

所以说封闭的状态下、盲从的状态下、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集权的状态下，建构幸福的难度很大。比如到朝鲜，朝鲜人人都红光满面，他们排序就是美帝最不幸，中国第一，朝鲜第二。现在为什么很难去建构幸福？开放了。中国又是一个特别喜欢比较的民族，天天跟邻居比、跟上级比、跟同学，同学女友比他的好看，他也会不幸福，跳楼的冲动很强烈。所以《魔鬼词典》记录中国人的幸福观有两句话，一句话是积极、主动、乐观的幸福，叫看见邻居家着火悠然而生的一种情感；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幸福，自己没有鞋穿，觉得特别不幸福，直到突然上街看到一个没有脚的人。

幸福源于比较，也就是说咱们有一个时代的病可能没有幸福感，咱们从来不跟自己比，国家跟美帝比，咱们跟邻居比，比着比着可能就失去了这种体验幸福的可能，倒也别把当代描绘得那么不堪，最好的年代往往是最坏的年代，最坏的年代往往孕育着最大的希望，这是一个转型期，我们不讲经济转型、制度转型，我们讲意识上的转型，国家意识的崩塌和个人意识的崛起，我们这代人特别不幸就在于处在了拐点上。我小时候有这样的意识，小时候我

正好上小学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受了传统教育，位卑未敢忘忧国，提起陆游、文天祥我们都感动，这为国命都不要了，看文天祥大义凛然写正气歌，后来听刘兰芳说评书叫岳飞传，然后最感人的一幕是岳母刺字，我们全家都特激动，后来我就特怕，我妈有一天把我喊过来，说孩子给你刺个字吧，太恐怖了，我的童年也是一个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意识崩塌的一个过程。

我们后来就经历的一个历程就改革开放，我们怀疑过、痛苦过，在这个情绪下不可能有幸福，只有焦虑，叫我不相信，北岛那诗多恨啊，我不相信天是蓝的，连这都不信了。那我们就在回头，我们的个人成长了吗？我认为意识是有巨大解放的，至少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像我们父辈，被组织指定老婆了，我们至少可以左右情感、食品和基本需求，但是更高层次的需求没有满足，所以综合考量中国的所有阶层在一个点上出现了问题，马斯洛说过人要建构幸福要满足五种需求，我们可以满足四种，第五种满足不了。生存问题，能在这儿谈幸福感的肯定都能吃饱饭；安全，没问题，你看政府大门都站着武警，那也能实现，安全感不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有社交，陈老师肯定不可能天天跟一些不喜欢的人交往，这叫圈子；陈老师有了财富，有了地位，北大杰出校友，他有受尊重的感觉。但陈老师没有一样东西，我也没有，自我实现，农民工没有、官员没有，自我实现成了我们所有阻碍我们形成幸福的核心原因，网上调查，官员 60%说自己不幸，我为你们操碎了心还不理解我。在这个背景下，我讲三个问题，也提一些建议。

按照一个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研究，说人类社会的四个层次决定这个社会的素质，第一就是经济，这是基础，经济由什么决定？你们知道目前中国没有幸福的基础，只有幸福的冲动，这是好事儿，但是没有基础是不幸的，第一个，经济靠什么决定？靠技术，套用房老师一句话，信仰和创新能不能成为一种信仰？没有。山寨是我们信仰，我们是一个印第安人说得特别典型的一句话，放慢脚步，等等灵魂。我们可以列出很多理由，我们积贫积弱，但我们缺少创新，2009年中国在WTO仲裁席上60%的被告是中国人，全世界的国家被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不如中国一个国家多，但我们还特光荣，我们聪明，那叫鸡贼，鸡贼到今天越来越开放，加上地主家被余粮了，西方经济不景气，贸易摩擦，因为知识产权引发的就越来越剧烈。于

是中央提出结构调整、产业创新，但这种东西看看我们的实体是不是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创新不可能有信仰，现在问乔布斯，别说乔布斯死了你斗不过他，他死了也斗不过他，我们不具备这样的头脑。

第二是制度决定了社会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制度转轨，而且这是中国的核心命题，我就不展开中国的制度有多么多么制约社会的进步，那法制能不能成为一种信仰，我们社会最大的谎言就是经常拿道德来替代法制治理整个社会，结果就变成中国式的道德绑架，就是自己必须当孙子，别人必须当圣人，每次我们对别人展开剧烈的道德审判，每次网上 PK 我觉得就是两类人，脑残和邪教的 PK，而都贴着道德的外衣。法国大革命前很多经典的著作我们都应该重温，据说王岐山副总理也在推荐一本，我觉得今天时代的特征仍然很像伏尔泰的一句话，人人高举心中的红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法制是我们必须恪守的制度的信仰，没有这个，没有明天，但这非常艰难，因为它首先约束的是强权，中国解释民主的专家很多，专注“汉有冲动”，美国小学课本用十二个翻译成中文，就是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制度上在启蒙，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没有这种基石很难到达。

第三就是文化层面，人文精神全社会的溃散，方舟子和韩寒之争其实是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之争，方舟子是一个工具理性原教主义者。这些年我们为了发展经济还适度的引进了工具理性，工程师清华就是代表，但清华的校训是陈寅恪先生写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可是清华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北大就出现了钱理群教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人文精神确实是全社会的，高校是责无旁贷的，是绝对要进行深刻的反思的，最后的堡垒是不能突破的，但我们已经突破了。北大校庆经常拿出若干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在炫耀着，可以炫耀，人文拿不出东西来，这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目前可能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工具理性推广了很多年，出现了方舟子这样的人，但你会发现他是价值非常混乱的一个人，价值理性没有建构的社会，盲目的推进工具理性，这是一个双面刃。但我们其实两个理性都是匮乏的，两个理性都需要重构，现代的工具理性和现代的价值理性，就是说我们每次纪念五四的时候都会悲从中来，呼唤了一千年，民族是价值理性，科学是工具理性，可是科学一调查，有 96.7%的科盲，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我们的有关部门还特别仁慈，要调查

人文精神的调查，估计具备的还不到 4%，那就约等于 4%。

回到这个，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弥补，三方面都缺失，就是经济上能不能创新成为一种信仰，制度上法制能不能成为一种信仰，文化上人文能不能成为一种信仰，如果不能，不谈幸福观，没有基础，有，可以谈，那怎么解决？我只能提一点自己的想法，教育的缺失是可以的，是成本比较低的，是个长线工程，是可以弥补的，教育的缺失是一定的，洗脑化的教育、工具化的教育一定在这代教育家里面在形成共识，中国缺共识，第一个共识是教育共识、人本共识、独立共识，西方大学精神又能讲的很明白，培养你独立生存、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是洗脑化、工具化发统一的文凭，中国的教育简直就变成了一个流程，就是把正常孩子变成痴呆儿童的过程，孩子走上社会再经过顽强的奋斗，从痴呆儿童变成周周。第二是改革的缺位，也有很多学者在说制度的改革十年来没有进步，在一个深层次领域反而有倒退，不再展开，很多学者应该对这个感同身受，我只讲一个名单，中国企业五百强名单中前 40 名都是国字头的，我们有关部门还居然声称国企携手民体齐手并进了，老爷携手二奶齐手并进了吗？我表示怀疑。

第三，直接带来了我们商业就是我们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整个商业移民的移民，红顶化的红顶化，市场的萎缩，我们现场的状态是发改委忙死了，市场闲死了，这是严重不符合今天时代要求的一个经济现象，发改委能忙死，改革闲死了，改什么了？官员忙死了，天天审批，加上审批带来的寻租，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但猛一看像孔繁森这些人也不少。然后在这个状态下，我觉得要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体制的改革和商业整体的升级。

用机制去构建幸福

RIM 中国区董事长 刘征宇

我很早就去了国外，感觉比很多人还更深入一点，为什么目前有很多人喜欢出国，现在大家只看到现象，没看到原因。有几个非常正常例子，是自己亲身体验的。第一，小孩高中毕业，他在高中毕业的毕业典礼上已经知道自己的出路了，比如说拿到了最好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了没有，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小孩一听就是去了哈佛、MIT，但是整

个场面不是太热烈，下面只有几个家长在鼓掌。但是有的学生说，他毕业了，明天就能够去他父亲的一个修车行修车，下面掌声雷动，这是一个正常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某总统为拿着很多东西的清洁工在旅馆里开门等等。另外，比较有趣的是现在很多小孩去了加拿大的学校里，小孩英语都不会说，家长非常担心大小便怎么办，老师说不用担心，这个小孩等到他18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他的。确实是，他比较耐心的花10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人、越南人等人都融化在他的社会里面，对他来说，融化一个外国的文化不是什么问题，如果分析一下，对自己文化他有这个信心把别人融化在这个地方。

当时我在国外有个朋友问我，如果电视机发明在中国，你认为能不能发明，我说为什么不能呢，这么好的创新，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发明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100年前，说我要发明一个东西，地球在另一端当场发射的东西我现在能看到，如果不被当作邪教被枪毙的话，至少觉得这个人是个疯子。我们没有一个社会环境，别人能想出一个就是错误的办法、错误的东西我们能够接受。他有这样一个接受新事物的社会环境，为什么我们接受山寨，所谓山寨就是别的地方已经成功了，我在IT公司干了很多年，任何一个东西到你这个企业里一做，他很想知道，比如中国银行，很想知道美国银行是怎么做的，比如我是做汽车的，那外国的汽车公司是怎么做的，这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山寨思想。

我的感觉彭老师写的题目还有一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感觉，第一，你把我们的幸福观限制在当代，又限制在中国人，这两个我倒都不太同意，以人为本，我认为这是中国传承做得最差的东西，我们希望人全部忍辱负重去做某一件事情，对个体是非常不尊重的。说起幸福我觉得我太太很幸福，20年她说我就要开车，但我不想去考试，你慢慢等着吧，等到什么时候我想去考就去考，没人逼她，到现在还没考出来，但她说这个机会我总是有的，只要我想去考我还可以，不过我就是不去。

刚才几个外国的例子实际上是给人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高兴，流泪也可以，你可以发泄不满。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个人价值的一个尊重，像我，我就是在0.5那个地方，我就不要0.6、618，我就是天天的很幸福的生活在0.5，为什么不？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古今中外还是有些东西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比如说全世界或者以前和现在只要有一个冤案，

最高兴的就是那个冤案被解决了，古今中外你的皮夹掉了，结果又回来，这个高兴是以前都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确实和 GDP 没关，还是一个文化思想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希望能够拓宽一点古今中外的思想，现在大部分中国最不高兴的就是很少有像石老师敢说敢干的，如果在一个单位说了某些东西，上面有关单位就来找你了。

我建议两点，一个还是围绕以人为本，幸福是个人表现出来的，不是组织，组织表现幸福都是被幸福了，说我们这批人现在很幸福，实际上问问每个人不一定，还是以人为本为主，就是让人家有改变的机会，有表达自己感情的机会，只要在你的法律框架下，对我来说不是说平均主义很高兴，你一千块我也一千块，你一百万，我两块钱，但是有这个社会整个的系统让我也能够到一百万，有这样一条通道，但是去不去我来决定，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我希望一个是受到尊重，一个是外面的机会会有一个平等机会的机制，刚刚李老师说的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什么拼爹，包括大学生说你 100 平米没问题，但是要有这个通道，但是现在没这个通道，一毕业两年有 100 平米，我的感觉在国外比尔盖茨没毕业还能够亿万富翁，没有说整个社会觉得比尔盖茨这么幸福，我们同学都不幸福了，他们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他有这个机制，让每个人都可以，如果微软的软件不能做，那就去扫地，你也能一百万。

两三个社会比较，我们这里还是限制、管制、控制过多，我们在社会构架不是说不管，这个管理是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不是我在上、别人在下，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至于目前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刚才几位老师说了，大家都要去考官，前两年我在信产部，很多处长和市长都要到企业去，所以我的感觉还是很正常的在利益上和个人发展上的个人选择，关键点还是刚才的两句话，第一，确实把以人为本做好；第二，具体的方面尊重和平等应该作为我们实施的重点。

简 讯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发布会在京召开

2012 年 9 月 17 日，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主办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欧美同学会召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麦可思公司创始人/首席专家王伯庆、麦可思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娇、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许睢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中心主任邓泳红出席了发布会。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留学发展现状、特点及热点问题的蓝皮书。本书既概括了中国百年留学的历史，也深入分析了 21 世纪以来留学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重点阐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十大热门留学国家及地区的情况。发布会上，与会嘉宾积极评价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NO.1》发布的重要意义，他们一致认为本书综合了权威专家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为留学发展描述整体情况、梳理政策脉络、提出多角度和操作性建议及理论指导，为我国留学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提供实践指导、学术资料和决策参考，将对我国留学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CCG主任参加“2012 中关村论坛年会”

9 月 13—14 日，以“科技创新与全球合作”为主题的 2012 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CCG 主任王辉耀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做了主题演讲。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层政府官员、知名专家学者、著名高科技企业家等对创新发展新模式、强化创新支撑发展和全面有效地拓展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本届中关村论坛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了“中关村指数 2012”，综合反映了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创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运行情况。此项活动也将成为今后每年中关村论坛的品牌性活动。

王辉耀认为，当前，国际人才驱动发展和竞争的趋势越发明显，各国纷纷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外来人才推动本地发展。中国要在 2020 年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中关村示范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与世界各个创新中心的连接点与桥梁。北京产业的优化升级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服务业所占比例已经超过 75%，中关村示范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发展转型可作为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窗口。因此，他提出中关村创新人才驱动的十大建议。

CCG出席“海外人才引进与城市国际化论坛”

9月19日，CCG主任王辉耀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海外人才引进与城市国际化论坛”，与“海归”精英邹学明博士、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王晓东等共同讨论了这一宏大话题，为成都献计献策。作为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王辉耀坦言未来全球经济能够复苏中国将扮演重要作用。

全球化已经进入人才流动的时代，前几年是货物流动，现在是资本流动，未来将是人才的流动，王耀辉强调，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够不断创新就是因为大量人才的聚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他坦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之所以难就是因为人才是最大的瓶颈，“中国有很多世界 500 强企业，但是真正有品牌、有国际影响力的寥寥无几，企业应该大量聘请国际化的人才，例如日产和索尼是美国人在管，雀巢 90%都是外籍人才”。

在人才争夺战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王辉耀结合成都的实际情况，给出如下建议：成都市实行差异化竞争策略，针对年纪大，资历深的高层次人才，制定资深的“海龟计划”；针对年轻、能够两头跑的年轻人，制定“海鸥计划”；针对世界 500 强高管这个群众，再制定相应的吸引计划，让这个群体为成都服务；为了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成都市可设立专门招聘机构，对重点人才主动出击，三顾茅庐等；四川可建立海外人才数据库，先搞清楚这个四川人在海外留学的分布，搞清楚四川有哪些行业需要对接海外人才，在什么地方，怎么来吸引他们，做到有的放矢。

CCG参加第十三次全国皮书年会

9月21日-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江西省社科院共同承办的第十三次全国皮书年会（2012）在江西南昌举行。会议围绕“皮书的内容创新与学术规

范”的主题，开展学术报告、主题论坛、圆桌会议等系列活动。CCG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社科院系统以及各高校、研究院所的300余名皮书课题组主编、专家、学者等参加了会议。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皮书已经连续出版了20年，近年来皮书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据介绍，目前皮书已经达到200多种，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2012年伦敦书展上，“皮书系列”的海外推广活动被列入中国主宾国重点活动之一。2011年，经过专家评审和论证，“皮书系列”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

不久前，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合麦可思研究院出版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NO.1》，作为中国首部留学人才蓝皮书，本书的出版和发布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吸引了国内各大媒体竞相关注，全国数百家主要知名媒体如新华社、人民网、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等都给予了全面及时的跟进报道。

CCG参加“2012中国宁波国际人才高层论坛”

9月22日，CCG主任王辉耀参加以“人才发展环境：创造与优化”为主题的“2012中国宁波国际人才高层论坛”。此次论坛共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芬兰等国的十位知名专家和企业家作了主题发言，并现场进行了提问交流。

宁波778创业资源中心签约揭牌仪式之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中国北方人才市场总裁蔡吉臣，中欧二期项目国际技术援助组核心专家孟祖安，加拿大人力资源和技能发展部经济政策处处长克里斯蒂娜·卡伦分别作论坛主旨演讲。王辉耀认为，当前全球人才流动速度加快，宁波要抓住民营经济、海洋经济、港口等优势地位和国际全面接轨，出台一系列的针对宁波发展产业的吸引国际人才政策，打造宁波成为国际人才港。他说，“宁波是一座港口城市，有世界一流的大港口，宁波同样有条件成为国际人才港。”

CCG联合主办“2012 中国高等教育暨海外人才论坛”

国庆假日期间，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麦可思研究院和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中国教育论坛联合主办的“2012 中国高等教育暨海外人才论坛”在哈佛大学成功举办。论坛紧紧围绕中国高等教育和海归海外人才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分享了他们最前沿的高等教育和海归人才的研究成果。

哈佛大学上海中心主任韦杰夫为论坛致开幕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博士在论坛上作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和“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两个主题报告，同时介绍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最近在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哈罗德·赫钦斯·伯班克教席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主持了王辉耀博士介绍课题的研讨。

在论坛“中国大学生就业”讨论中，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张景岫、执行院长郭娇博士、麦可思教育咨询专家王可介绍了麦可思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展的主要调研及研究方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研究所常务主任张伯庚教授主持了麦可思问答环节与圆桌讨论环节。在研讨座谈环节，韦杰夫主任、王辉耀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查建中博士及麦可思研究院的三位专家，与参会人员深入探讨高等教育发展有关话题，提问踊跃，反响热烈，受到哈佛大学学生，专家和学者的欢迎。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www.ccg.org.cn）简称 CCG，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所发起，由国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国际化智库研究机构。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公共政策等专家的参与，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建设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成为国家、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高端国际智库，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提供独立的和客观性的研究。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包括：建言献策、国际问题、国际人才、可持续发展、企业国际化、华侨华商、海外留学与海归创业与发展等领域，CCG 尤其在国际人才发展和海归创新创业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如 CCG 于 2008 年参与中组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2》的可行性研究工作，负责“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研究；CCG 于 2011 年 5 月完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的“完善中国绿卡制度”的课题研究报告；CCG 于 2010 年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侨办委托的“海外华人华侨专业社团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并荣获国侨办优秀课题论文二等奖；由 CCG 编辑出版的《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是国内首次专门研究和出版中国出国留学和回国发展的蓝皮书。

中心还通过研究、出版、刊物和讲座等一系列的方式，研究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相应的研究和政策对策，供政府、企业和公共机构等有关部门决策采纳和参考，成为中国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高层次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目前已成为中国有关部门政策咨询的一个国际智库，承接了多个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课题；并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部委保持密切联系和畅通的建言献策渠道，为这些部门提供咨询和参考；已向中国政府有关部委提交过多份建言献策报告，影响和推动政府的相关决策，其中部分报告已经成为国家推出的政策参考和依据。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也是海内外留学人员、中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前政要智慧和思想交流的平台，通过举办圆桌、午餐会、研讨会和中外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建立广泛的国际交流和思想影响力的网络。